

重点
阅读

《非尔雅》是一部关于北中原记忆的“口语版词典”

□何 弘

冯杰给他的这本集子命名为“非尔雅”，意思大概是说这本像词典的书其实并不是词典吧。如果单看其目录上一个个排列整齐的词汇——都是豫北方言的口语词汇，冯杰称之为“北中原口语”，确实像词典。但以冯杰作为诗人、作家的了解，我们也不至于误认为这本《非尔雅》就是一本词典。

不过，虽然冯杰在书名中明确标称自己的作品不是词典，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却明确标称该作品是词典，但它们的实质却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这是具有文体创新意义的作品。

《非尔雅》可以作为散文来读。这好像是一句废话。冯杰的这本集子本来就是作为散文写作和出版的，当然是散文了——而且我以为是很好的散文。散文写作本无定法，凡是无法归类的文学样式，统统划到散文堆里，大致差不到哪里去。这些年，小说的写法、学问的做法、历史的弄法等悉数被搬到了散文写作中，散文文体边界的界碑早不知被挪到了哪里，怎么写都是散文。冯杰的这批散文却并非这样勉强划过来的。

《非尔雅》从北中原民间常用的口语词汇出发，以轻松自由的笔触，描写了豫北农村的自然景象、生活景象、民间传统、历史记忆和人情世故。书身边事，写心中情，独抒性灵，言简意赅，短小隽奇，活泼自由，信手拈来，自然成趣。作为散文，它继承了萌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晚明之小品文的优秀传统，是对渐失中国传统特色的当下散文创作之流弊的一次反正。

《非尔雅》也可以当作诗歌来读。这好像是一句胡话。冯杰的这本集子，除了偶尔引用自己和别人的诗作以及一些童谣、民谣外，通篇不合辙、不押韵、不断行，怎么能当诗读呢？而实际上，作为一位诗人，冯杰的散文写作明显借鉴了现代新诗的构思和表达方式，具有突出的诗化特征。相对于旧体诗词，中国的新诗基本是在西方诗歌的影响下重新发展起来的一种文体，注重通



过意象来表达一种感觉、情绪、情感、观念等，除保持内在的节奏外，句的长短、押韵的方式等都可自由处理。应该说，冯杰的这些文字大致是与新诗的这些特征相当契合的。

从总体上看，这本集子中每一个篇章所描写的词语都可看作一个意象，这些意象共同组成一个意象群，反映了北中原人的生活场景、历史记忆、情感生活等，当然还有作者个性化的记忆、感觉与想象。从每篇具体的文章看，不管是写人、写事，还是写其他的东西，作者并不注意描述的完整性，而是注意把人事物最有代表性的特征突显出来，或者说是通过一个个意象的呈现，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这都与新诗的特征相符合。

从语言本身看，这本集子的文字同样具有新诗的特点。我们可以随便抽出几个片段读读，比如《蝴蝶》，它的结尾是这样的：“快乐高悬在风中。那个小小的词汇正在乡村的月光里向上，再向上。会跌落。会颤动。还会在我故乡北中原辽阔的大地上，喊痛。”“如果我再给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这都与新诗的特征相符合。”

快乐高悬在风中
那个小小的词汇
正在乡村的月光里
向上，再向上
会跌落
会颤动
还会在我故乡北中原辽阔的大地上
喊痛

这不是诗又是什么？如果觉得这是孤证，不能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再读读《襟》，它的结尾是这样的：“整个世界上，一粒粒温暖的小扣子们，都在时光里，在外祖母羸瘦而温馨的指缝里，一一失落，像漏掉的迷路的小米。成苍茫蓝夜里一颗颗星星或大地草叶上的露珠。从此以后，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温暖的扣子。它遗落了。姥姥的手从此不会再缝。”同样，我们把它分行排列：

整个世界上
一粒粒温暖的小扣子们
都在时光里
在外祖母羸瘦而温馨的指缝里
一一失落，像漏掉的
迷路的小米。成苍茫蓝夜里
一颗颗星星或大地草叶上的
露珠
从此以后
我再也找不到
那些温暖的扣子

它遗落了
姥姥的手
从此不会再缝

其实这样的文字在冯杰的这本集子里俯拾皆是，如果我们一一为其断行重排，恐怕就把它排成一本诗集了。冯杰说：“正因为我一直心存如此幻想，长大后，我才能当一位诗人。”冯杰所说的“幻想”，我理解是一种超越具体的事物而趋于玄远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文字，就是境界高远的诗。

在另一本集子的一篇文章里，冯杰曾说，一个在乡村度过了童年的人，生活在繁华的都市里，对童年与乡村的记忆与怀念，就是诗。哪怕你不把它写出来，

你也是诗人。我以为，冯杰这本集子写的基本就是他对于乡村与童年的怀念，不管分不分行都是诗。

《非尔雅》还可以作为小说来读。这好像是一句扯淡话。这些年，小说散文化、散文小说化渐成常态，每每有同样的文字今天当小说发，明天又当散文参加评奖并得了奖。小说和散文的界限早就模糊不清了，散文可当小说读原也正常。通常，现代小说被看作是人类经验的记录。冯杰这本集子中有很大部分就是作者对其童年和乡村生活的记忆，也就是其人生经验的书写，其中有人物、有叙事、有历史、有经验。

像《杀戏》，就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像《支棧》，很好地记述了当时农村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冯杰的这篇文章，很好地继承了中国笔记小说的优秀传统，里巷杂咏、笑言戏谈、奇趣异闻、凡人琐事，略经点染，即成妙文，颇具当代《世说新语》的味道，其中不少篇章堪称小说之上品佳作。

其实，前面从文体出发所说的这么多，对读者的阅读来说实在没什么意义，我们尽可以将文体之类的考量或羁绊放在一边，这样也许更能体味出冯杰这些文字内在的韵味和美感。

冯杰善诗文、长书画，内具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兼得中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和滋养，外用不拘格套的表达方式，行于当行，止于当止，有话则长，无话即短，信笔处蕴含深意，自见高格，其文富有情趣、理趣、文趣，读来别有韵味。

冯杰语言功底扎实，笔力高致，他行文自然，于朴素平淡中见深意，在寻常叙事中藏臧否，信腕挥洒，灵动自如。冯杰的文章取材广泛，或自然景象，或凡俗人物，或日常器具，或民间风习俗，或闲言碎语，或平常往事，略加点拨，顿时意趣盎然。冯杰想象奇特，雅致脱俗。想得到，写得出，这就是水平。

冯杰的作品有对乡村世俗景观、生活状态的描写，更有思想火花、人生况味，使人能从美文的享受中获益良多。

■开卷絮语

紧扣时代脉搏，倾情书写家乡浙东人民的时代精神图式，展现大历史奔流中浙东人民的传统、现实、文化与人性底色，是浦子一贯坚持的文学策略。他的创作总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捕捉鲜活的社会生活，深入历史文化生命的深层，将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对浙东父老乡亲与文学的生动追求熔铸在一起，深耕细作，力拔千钧，开创了一幅以厚重的历史感、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鲜明的浙东现实色泽而独树一帜的文学景观。浙东的传统与现实、文化与人性、生命与图腾等都是他文学抒怀的对象，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浦子是一个痴迷于浙东历史与文化的作家，他坚持不懈地解剖着家乡浙东土地上的文化人格，书写着浙东芸芸众生的精神操守和饮食生活。他的“王庄三部曲”、《桥墩不是桥》都以其特有的浙东文化底色和人性解剖广受关注，新著《长骨记》是继此之后又一部力作。作品以H市首富冯家子公司董事长施德富与祖籍浙东山海县的海商方靖北之间的一间商铺产权归属的纷争为主线，书写了施德富女儿H市人大代表、先进青年企业家典型施大男与方靖北之间围绕商铺产权之争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折射了在商品经济大潮下某些基层法制工作者沦为“司法掮客”的变异人生与扭曲人性，深入思考了中国社会在法制进程中的痛点以及需要突破的深层着力点。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行法难之病象在中国个别基层政治、司法系统中近乎一种常态。某些地方领导和司法干部违法违规干预案件，以各种手段干扰、破坏司法公正，个别基层司法干部知法犯法，忘记初心，出卖灵魂，用人赋予他们的权力谋私利，热衷于权力寻租，甘为司法败类，这种病象已经成为严重阻碍我国推进法制文明进程的毒瘤。《长骨记》直面现实问题，将现代基层社会中的治理难点糅合在一起，为当下中国基层法制文明建设探路，具有强烈

为法治背景中的人性美唱赞歌

——评浦子的《长骨记》

□朱首献

的现实关切和时代感。在基层的社会网络中，权大于法在某些官员的内心根深蒂固，甚至一些司法工作者自甘将法律拱手出让给权力。H市某区区委书记江枫玩弄权力于掌中，权力的欲望甚至让他觉得封建时代的县官“拍桌就能定案来得舒坦”。以法院院长王正中一流为代表的H市的司法干部口口声声代表人民，其实，在他们心中，人民二字已经变了味道，他们已经忘掉了自己的初心，王正中父亲临死前交代他：“正中，你心里得有党性，得有良心。”但党性和良心早被他出卖给了个人欲望和对更高级权力的奴颜婢膝。某些基层司法工作者心中无“法”，个别地方官员用权力干涉司法公正，这些丑陋的存在都使得施大男和方靖北之间一场原本极其简单的商铺产权官司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对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是浦子创作的一贯优点。从《龙窑》开始，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在不断地走向现实，挑战世俗，这是浦子寄予现代女性的一种新希望。如果说《龙窑》中的寡妇翠香、玲娣只是一种遥远的存在，那么，在《大中》中的女大学生婴翠、《桥墩不是桥》中的律师薛家丽、社会学专家薛敏，乃至《长骨记》中的H市人大代表、先进青年企业家典型施大男这些女性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浦子寄予理想女性的特殊素质，她们越来越被赋予知性的品质，但她们身上那种原始勃发的乡土芬芳却依然没有丝毫改变。正是这种原始的勃发力，使得浦子笔下的人物更显得真实，女性的刻画也更加深刻，形象的塑造更加接地气。例如薛家丽，她与几任村长的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都围绕着她对桃花庄的美好明天展开，这种看似放浪的行为，既显示了乡村治理中现实的窘境，另一方面也闪耀着圣洁的色泽。而施大男，她的看似玩弄各色权力场的主导者于掌中的行为似乎可以给她贴上“欲女”的标签，但反过来，在个别基层司法腐败的现实中，你又不得不佩服她才是一个“真汉子”。

任何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地



理和不懈编织的文学空间，浦子亦如是。多年来，他的创作立足于浙东，无论是王庄，还是桃花庄，这些都有其家乡的影子，《长骨记》虽然不再局限于浙东山海县一隅，而是将中国内陆的H市与上海带入了叙事的空间布局，给我们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叙事空间架构，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和浦子的故土情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充分体现在他对方靖北这一形象所寄予的深厚情感上。方靖北是浦子的山海县同乡，他们同样接受着浙东深厚历史和优秀文化血脉的滋养，住着一样的道地，一样把道地大门称作阊门、管巷道叫墙弄，这里有盖仓山摩天柱、伍山石窟、下洋涂、前童古镇、潘天寿故居、柔石故居、徐霞客大道……这是浦子和方靖北的精神故园。方靖北虽然叱咤上海滩，成为浙商的典范，但他真正的精神地理依然是养育了他的山海县方庄。这种文学空间上的走出家乡写家乡，使浦子作品的精神格局在广度上有了更进一步的伸延，而在其深度上也有了相当大的提升，这喻示着浦子正努力尝试在一个更大的、更具有时代性的视野中来审视中国的社会现实，思考文明

中国的出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长骨记》于浦子而言，是一种大的自我突破和超越、一种文学空间的再出发和精神家园的还乡。

浦子的作品，总是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温暖，这与他传统文化始终保持一种虔诚的敬畏休戚相关。这种敬畏深植于其文学的冲动之中，进而转化为他的创作中的一种自觉的审美实践和文学记忆。可以说，浦子的创作不是在进行着各种文化寻根的尝试，而是在他的文学情感深处，始终有一个巍然不动的文化之根，它不需要去寻找，需要的是表达，这个根就是浦子对于浙东敦实儒雅的传统文化的敬畏。无论是“王庄三部曲”、《桥墩不是桥》，抑或新作《长骨记》，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在浦子的作品中蓬勃地流淌。方靖北上敦厚儒雅的儒商精神隐隐有着《独山》中王传达的宽容温良，也有着《大中》中王德青的隐忍敦厚，而他心里装着“这世上的人都不要了”的祖先孔圣人则是浙东的文化精髓。浦子塑造方靖北这一形象体现了他对于浙东文化精神和人格人性的礼赞，展示了浙东人在历史激流中的拼搏血性与温良中和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浦子带着浓郁的浙东传统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理想。

浦子是一个具有内心深度的作家。别林斯基曾说，“如果艺术作品只是为了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发自内心的主导思想的强有力的主观冲动，如果它不是苦难的哀歌或热情的赞美，如果它不提出问题或者回答问题，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僵死的东西。”浦子的创作是有着鲜活的生命力的，它让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一个优秀作家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身处的时代、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善良美好人性的真诚以及对国家兴亡深切的忧患情绪。浦子曾自喻自己是一把中国乡村社会的解剖刀，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他是一把带着现实的温暖和人性的关怀的解剖刀，而绝非只是那种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的一个冰冷的存在。

书香茶座

去年暑月，与潘振平兄一起去了向往已久的黑龙江，自漠河到黑河，漂江登岛，踟躇追索清代遗迹，虽只是上游的一段，也算初识华夏极北之地的这条著名大江。临行前夕，冯保善教授发来新著《明清山人研究》书稿，即携于途中断续阅读，书中所论者江南，本人所经行者塞北，竟一无违和之感。在撰写这篇小序时，蓦地跳出这样一个题目。

保善是前辈大学者陈美林先生的高足，相识二十余年来，知他一贯潜心研治古典小说，成果甚丰。他将明清山人论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群落，所谓特殊，也由时人（包括后人）的鄙夷嘲讽呈现出来。“江湖”二字，如同本书主题的“山人”，历来贬损亦多，其实相比较于庙堂之伪和市井之陋，尽管不免斑驳陆离，仍显得开阔辽远许多。“软枕江湖客，提携日月长”，是老杜的诗，也可为一代代不得仕进的读书人摹形绘像，画出其放诞洒脱，以及那份磨洗难尽的无聊无奈。

晚明乃至清前期的山人，虽然种种色色，大体也就是杜甫笔下的江湖客了。保善将之概括为“一个由时代造就，又不被时代所重的群体；一个曾经在文化史上存在，也做出了特殊贡献，却鲜被后世子孙提及的群体”，并进一步作出分析：“他们多终身为布衣，能诗善文，自标山人，却不愿如山林樵子老死山中，更不愿意放弃他们在俗世间的恣意享乐与人生快意，而是穿梭在都市与山林草野之间，既纵游天下山水名胜，享受青山绿水的赏心怡情；又进出达官显贵门下，靠打秋风获取钱财馈赠，隐入迹之山人，食人间之烟火。他们中不乏不学无术之辈，也多才情洋溢、经纶满腹之人。他们歌唱自然，吐露心中之声；谄媚权贵，唱言不由衷之音。身为布衣，偏喜结交权贵；于仕途之外，偏好相与仕途中人；不事治业营生，一样地吃喝玩乐。”这是在大量实证基础上作出的归纳，精彩且精核，只是略过了些诗性表述，如能勾画几笔其如影随形的艰窘寂寥，或更为完整。

透过本书，可知“山人”与“高士”“布衣”等等名色，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久远的生生不息的存在，清代的博学鸿词科，当下的各类智囊智库、大师大咖亦差近似。可为什么偏偏是在晚明、在江南蓬然而起，成为文坛中一股风潮，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引发世人关注和追捧，也同时引来一片诋议？明人邹迪光说“今之为山人者林林矣，然皆三吴两越，而他人殊少，粤东西绝无一二”，李维祺称“大江以南，山人诗人如云”，皆强调了其地域性。作者挖掘其深层原因，引文徵明《三学上陆家宰书》：

开国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学校廉增正额之外，所谓附学者不啻数倍。此皆选自有司，非通经能文者不与。虽有一二幸进，然亦鲜矣。略以吾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终，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

旧的科举体制曾在很长时间内被一笔抹杀，而今对其传承儒家经典、引领读书风尚、打破社会阶层固化等积极意义给予重新评价，但那无疑是一条歧路。文徵明的信写于正德年间，陈情的对象是新任吏部尚书陆完，痛说苏州生员的出路问题。作者说：“出路意味着生路，而生路发生了堵塞，‘不通则痛’，在痛苦中，必然要有变数产生。”将生路问题作为山人群落出现的重要原因，发前人所未发，亦契合历史与地域的真实。

痛则求变。既然科场无望，一些才识之士就毅然弃却“头巾”，寄情山水，专注于读书写作。还记得《金瓶梅》中那篇自诩读书人的“哀头巾文”吗？而随着王稚登、陈继儒等布衣名士的崛起，随着山人群落的渐成气候，尤其是朝中显宦幕名廷揽的广告效应，自然也引发一些不学无术或不学有术之辈打起名号，招摇撞骗。薛冈《辞友人称山人书》罗列山人者流“交好阳密，阴伺隐微，满腔机械，不可端倪，持人短长，快我齿颊”等恶行，不耻与之同列。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设“山人”一目，对王稚登、陆应阳诸人颇为鄙夷，为朝廷下诏驱逐山人拍手称快。也有人力辩真山人与伪山人之分，如徐应雷《读舟州山人集》：“所谓山人者，必有名山不朽之业，若余州山人，是真山人；先朝孙一元，自号太白山人，其标韵高绝，是真山人，其有位、无位勿论。”在他的观念里，山人即高士，不在于是否有功名官位，而在于有无“名山不朽之业”。实则放眼尘世间，又有哪一个群落、哪一个领域不是龙蛇混杂，不被指责挾伐呢？200年后，大名士洪亮吉在奏折中顺带抨击翰林同僚：“大学三馆，风气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门阍侍卫，以求传递代卷，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翰林院向称储相之地，与散落江湖的山人自有云泥之别，以老洪所列举，也是一样的丑陋不堪。

晚明又是一个个团块崛起、党派林立的时代，顾炎武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政，催生了一个影响巨大的东林党，也引得浙党、齐党、楚党等一时并起，彼此攻讦倾轧，山人群落未见有过多牵涉。本书第二章重点论述几位明朝著名山人，如孙一元、陈继儒能自觉远离政治，隐逸山林；而谢榛、徐渭、王稚登虽各有依附，写过一些唱酬应景之作，却无意于参与党争派斗。学术的重要意义，当在于抉发人性之精微。书中对此数人各设专节，皆全须全尾，自成一传。保善文笔甚佳，每拈取诗文，从容赏析而灼照幽深，渐及其于癖好性情与心路历程。他以“丘也东西南北人”写孙一元，写其身世遭逢之奇，写其格调高旷与文字之美，也写其对军国大事和民生凋敝的关切忧愤；以“百年一流寓”述谢榛，述其觅食王府的丰足与愁闷，述其意气风发、慨然替友人排忧解难，述其擅作乐府小曲、尤擅凄艳哀怨的商调，更妙的还是讲述了“后七子”中李攀龙、王世贞等人对他的“始乱终弃”；以“茅屋老畸人”记徐渭，记其文章与书画天才，记其入幕、逃幕的生计艰难与傲骨仍存，也记其因心疾自戕妻妾和牢狱之灾；以“在清浊之间”论王稚登，论其攀附与骄矜，也论说他的重恩义，对辅相袁炜如是，对名妓马湘兰亦如是。至于大名鼎鼎的陈继儒（眉公），则以“闲人不是等闲人”来概括提醒，他的弃绝科试之途，他的坚拒权贵之招，他的诗文书画成就，以及他对筹边和救灾的建言，皆不可等闲视之。国事已大不堪，所幸屈居于崇禎十二年辞世，否则真不知他会怎样面对那场浩劫。

本书第三章专论李渔。明朝沦亡时，李渔33岁，似乎没有参加抗击清兵的义举，也没有抗拒降清发令，与家人避居故乡兰溪的山中，偶尔也将郁闷发诸诗草，“鬓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屋留兵灾后，身活战场边。几处烽烟熄，谁家骨肉全？借人聊憩已，且过大平年。”满腹经纶的他选择走陈继儒的路，大隐隐于市，卖赋以糊其口，不赴新朝的科举考试。不管是在杭州还是在金陵，李渔都是一个自食其力的文人，写诗撰对，编撰小说戏曲，也开书铺，设家乐，留下了一笔极可珍贵的文学和艺术财富，而他的《芥子园画谱》与《笠翁对韵》，至今被视为不可替代的专业教材。毛先舒称自司马相如之后，靠卖文为生者很少有人比得上李渔。时人讥为打秋风，他本人也曾自嘲“终日抽风”，实则打秋风从来都非易事，显宦豪绅中没有几个白掏腰包的傻子。“我以这才换那财，两厢情愿无不该”，笠翁的小诗略带调侃，表达的却是心里那份笃定和坦然。

保善详细解析了李渔的小说集《无声戏》《十二楼》和戏曲《笠翁传奇十种》，引领读者领略构思之巧与文字之美。清初号称文坛祭酒的吴伟业说他“江湖笑傲齐翥，云雨荒唐忆楚娥”，调侃戏谑，褒贬皆在其间。后来金庸有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不知是否有所借鉴，意愿则一变而为全然称扬，落于二义。李渔的堪称称山人中的杰才，堪称笑傲江湖的隐士，不管背负着怎样沉重的心理和生存压力，不管面对或背对多少冷嘲热讽，不管晚年怎样的困顿寥落，都不能遮蔽他那份“一笠浪浪自放歌”的潇洒。那是读书人的江湖，是山人才子的江湖，也是较多存在于精神和艺术世界中的江湖，做过显宦的吴伟业虽已退居林下，与之仍隔一尘，只有叹美的份儿。

读书人的江湖

冯保善《明清山人研究》读后

□卜 键